

教会大学纷起于民元前后的内因

——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

张丽萍

提 要：1912 年民元前后，为中国教会大学频繁发生时期。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跨文化互动”的产物。配合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内在因素对教会大学的发生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如 19 世纪末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带动教育传教士来华，为教会大学准备了“办学资源”，基督教在华初级、中级教育的规模化，为教会大学发生准备了条件，以及海外捐助的增加，为教会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援等。

张丽萍，博士，四川大学校史办研究员。

主题词：教育 基督教 华西协合大学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已经有在华传教士为大学做准备，经过多年来似乎毫无成效的鼓动，“大学时代”在突然间开启，其时正是晚清、中国近代大学起步的时候，1901—1914 年间，就有 10 余所教会大学宣告成立^①，如当时有人所列举的：“上海圣约翰与沪江，苏州之东吴，福州之鹤龄与萃英，广州之岭南，香港之司提反，北平之协和、燕京，山东之齐鲁，湖北之文华，湖南之雅礼，南京之金陵，四川之华大，均皆欧美各公会传教士创办之大学。”^②这些大学占据了五大“学区”^③的 10 座中心城市。

教会大学发生在近代中国国力凋敝、西学勃兴的温床上。在清末民初，尤其是所谓“庚乱”平息后，国内对西学、西化的热忱曾高涨一时。面对“教外人民闻道欲动”，教会学堂“济济盈庭”，教会事业“一日千里”^④，西方教会趋时而动，以加派教育传教士、兴办高等学校的方式，作出积极的响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办学介绍科学技术，这些都是教会大学能够创办的一些重要历史因素。配合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一些内部的、微观的因素也对教会大学的创办产生作用。

一、“未开发的中国”对教育传教士的依附

19 世纪是基督教传播史上的“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基督教被传到世界各地。这一世纪所有弥赛亚式的拓展计划，主旨乃是用“福音之光”去照亮黑暗的异教世界，“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9），即将来临的 20 世纪“千禧年”，则强化了神学中弥赛亚救世的热忱。此时，东方的上空出现一束充满希望的“灵光”：一方面“未开发的中国”激发了“中华归主”的布道热忱，另一方面“千禧年主义”张满了传教士盼望的弓，渴望倾其毕生于中国福音事业——“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

早在 1877 年，基督教战略家杜嘉德（C. Douglas, 1830—1877），就提出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具有古老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⑤。如果说基督教大学是禀承教会意旨、由少数传教士在中国实施的教育行为，那么推动大批具有较高学历、良好素质、极高热情的传教士来华的海外布道运动，无疑是基督教大学兴起的一个前兆。

19 世纪以来，欧美社会福音运动带来基督

教的奋兴——“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 (W. Carey, 1761—1834) “引领异教人民归正”的口号, 以及“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穆德 (John R. Mott, 1865—1955) “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天下”的信念, 传教士有了把福音广传天下的信心, 于是纷纷放下世上的享受, 今生的名利, 美好的前途, 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东方开荒布道。19世纪中叶, 戴德生 (Hudson Taylor, 1832—1905) 创立的中国内地会, 堪为基督教海外宣道团体的楷模, 带动了一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陆。受戴德生信心宣教的激励, 来四川的传教士中就有“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 (W. W. Cassels)、章悟道 (M. Beauchamp)。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盖士利: “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在死荫幽谷中, 没有机会接触福音……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 还能袖手旁观吗?” 于是立志来华“传道救人”, 在四川先后创办有初等小学、天道学校、华英学校、护士学校, 并领导圣公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缩写 C. M. S.) 参与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和建设。

由穆德等人领导的学生志愿运动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S. V. M.)、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 (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 C. M.), 则对基督教在华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80年代海外宣道运动的狂飙从北美大学吹起, “全部去, 到全地” (all should go and go to all) 点燃了大学生献身海外的热忱, 纷纷签下“渴望、甘愿到世界未听福音之处”的“普林斯顿宣告 (Princeton Declaration)”。S. V. M. 精神不久便传到欧洲大陆。以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 送走八千多名大学毕业生远赴异乡宣道, 而其中又以到中国来的占大多数。这批来华的大学生布道士以医生、教员、工程师的身份开展医疗、教育、慈善、文字事工, 教会事业因之更上一层楼: (一) 教会学校日增而月盛, 自幼稚园以迄专门学校、高等学府, 无所不包; (二) 医疗卫生机构遍布各地, 从专门医院、综合医院, 以至医学教育机构, 应有尽有, 统计1935年中国半数以上的医院是由教会所经营的, 此项事业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道工作”^⑥; (三) 建立起各式神学院校, 以培训华人领袖。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基督教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毕启 (J. Beech)、林则 (A.

W. Lindsay)、卜觞济 (F. L. Hawks Pott)、福开森 (J. C. Ferguson)、司徒雷登 (J. L. Stuart)、路思义 (H. W. Luce) 等, 均是学生志愿“誓卡”的签约者, 可见这一运动与基督教大学兴起的关系。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布道士, 曾被人喻为“闯进瓷器铺的一头牛” (a bull in the china shop), 既不了解中国风俗民情, 也没上过什么跨文化宣教课程, 既要突破地理的障碍, 更要突破文化、社会、语言的障碍, 然而福音中华的雄心壮志, 赋予他们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精神。受海外宣道运动和学生志愿精神的感召, 兄弟同行、夫妻共济、父子同心远道来华者不在少数。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 加拿大的启氏家族 (Kilborn Family) 实为近代传教士中的典范, 从1891至1963年启尔德 (O. L. Kilborn)、启真道 (L. G. Kilborn) 一家三代服务中华70年, 为中国医学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其中作为第一代传教士的启尔德于1891年在戴德生的引导下, 携妻子自愿奔赴西蜀, 成为英美会的先遣队、科学医学的先驱者, 后来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并创建了大学医科。与加拿大启氏家族相似, 则有英国的陶氏家族 (Davidson Family), 陶维新 (R. J. Davidson) 为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人之一, 其三弟陶维廉、四弟陶维礼、五弟陶维义和他的儿子陶又新, 先后都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大学牙科创始人林则, 则是在多伦多大学签署“誓卡”后, 与夫人林铁心 (A. T. Lindsay) 一道前往“地球另一头的东方帝国”, 成就了他“中国口腔医学之父”的美誉。

梁家麟将海外布道运动推动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鉴定为教会的“传教资源”扩充^⑦。正因为海外布道运动, 带领众多名校高材生、学者和专家来到中国, 改变了教会以布道为唯一选择局面, 来华的传教士大多身兼牧师、医生、教师等多重身份, 赋予他们医学传教士、教育传教士的称谓, 甚至有“世俗传教士”之说。毕启、启尔德、林则等传教士, 虽然由教会派遣而来, 但终其一生, 并没有拯救几个灵魂, 这并非因为传教效果不佳, 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花上多少时间在直接传教工作上。

二、基督教教育体系升级至“塔顶”

自1839年基督教在华设校以来, 教育递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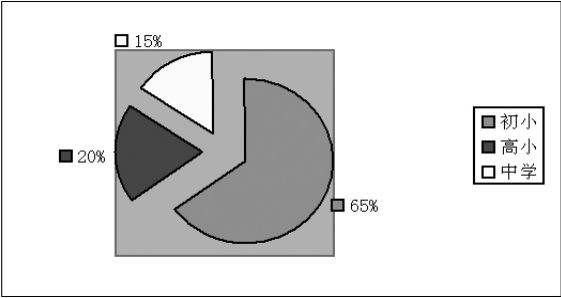
的阶梯可分三级：（一）推广小学，遍设于城乡乡镇，以期教育普及；（二）兴办中学，分布于各省都会，以期教育提高；（三）开创大学，设于全国大埠要地，以期高等教育^⑧。因此有传教士把基督教教育体系比喻成一个金字塔——数量众多的小学是塔基，数量适中的中学是塔身，而量少质优的大学则是塔顶。略有不同的是，毕启则以“圆锥体”来形容，他说大学是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顶石”和“尖峰”。清末民初，基督教已在华西地区发展出了规模化的初级、中级教育，而毕业学生也逐级上升到教会所提供教育的极限水平，大学成为一种迫切的亟需——否则，就成为华西基督教教育体系中的“缺失”^⑨。

四川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经过 20 多年的经营，已具备了初级与中级教育的规模化（见下表）。1899 年差会在四川办的小学仅 31 所，学生共 806 人，到 1907 年，小学猛增至 173 所，学生达到 3316 人^⑩。华西基督教教育会（West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Union，简称华西教育会）把中小学堂分为四个等级，幼稚园（2 年毕业，年龄约 5—7 岁），初等小学（5 年毕业，年龄约 7—12 岁），高等小学堂（4 年毕业，年龄约 12—16 岁），中学堂（5 年毕业，年龄约 16—21 岁）。教育会所辖中学，1907 年为 5 所，1908 年为 8 所。这些中学“开办多年，颇著成效。迩来由此项学校毕业者，岁不乏人。莘莘群彦，皆征有用。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材，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⑪，故创办大学实属必要。

图表 1 1908 年华西教育会各等级教会学校统计^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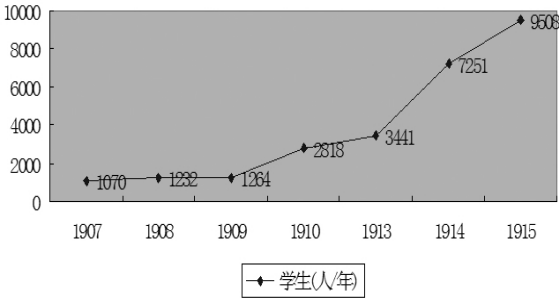
	学校	男学生	女学生	学生总数
初等小学堂	24	378	407	785
高等小学堂	12	143	109	252
中学	8	182	3	185

图表 2 1908 年华西教育会各等级学生构成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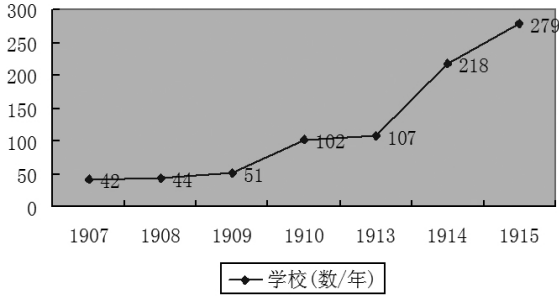
对于发起华西协合大学，1906 年云、贵、川三省西教士顾问部决议中，提出了两大理由：“第一，华西公私所立中等学校已属不少，惟大学尚付阙如，何以为学生异日次第升学之地；第二，以华西地界西陲，大学既立，亦可使边民夷族渐被文化。”^⑬惟有开办大学，方能使教会教育连络一气，使教育体系一气贯通：一方面，各级学校为大学输送源源不断的生源，另一方面，大学又为各级学校提供良好师资，可谓“尽善”之道。

图表 3 华西教育会注册学生人数



从表象上来看，设立大学是对教会教育体系的“补缺”，深层意义则是对基督教人才体系的“晋级”。最初西国教士以钱米等好处，招收孤苦、“愚钝”子弟入学，令其信教，即所谓“米教徒”，所能提供的教育也很粗浅，结果如启尔德所言“十之九不成材”。只有发展出一个完备的教育系统，并逐级提供“技术的”“专业的”训练，方能训练和造就出教会人才，使他们能立足社会，指导社会，而大学正是培养“精英”的训练场所。

图表 4 华西教育会注册学校总数



相比其它省区，华西基督教教育体系似乎更为完备，若以进入幼稚园为起点，分别有百分之八十四念初小，百分之十念高小，百分之四念中学，而百分之一念大学^⑭。毕启曾特别提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大学没有足够的学生，基督教教育体系往往是顶部变尖，甚至是“秃

顶”，而华西则走对了方向，例如 1924 年华西教育会学生总数达 1.8 万人，其中华西协合中学就招生三百多名，超过 1914 年所有中学招生的总数，“如果他们每两人中就有一人进入大学，可满足大学 10 年以上的招生人数。”^⑥

基督教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也被运用在大学建设中。1910 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办以后，以大学为依托，建构出一个缩微版的教育体系，至

1924 年华西校园内先后开办有附属学校 8 所，学生人数分别为：协合中学 310 人，男女师范学校 45 人，神道学校 23 人，高琦中学 100 人，弟维小学 68 人，夏令学校 197 人^⑦。

国内其他基督教大学也是区域教育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下的一种产物。根据 1922 年《中华归主》资料，整理出教会大学所在省区的教育体系表。

图表 5 1922 年部分省区基督教教育体系^⑧

	初级小学		高级小学		中学		大学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江苏	554	11550	120	5015	52	3323	金陵、金陵女大、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
山东	942	17083	142	2782	41	1489	齐鲁大学
直隶	316	8554	44	5188	24	1953	燕京大学
浙江	283	7872	53	1746	19	974	之江大学
福建	852	25568	96	4612	20	1510	福建协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湖北	238	8049	58	2185	17	852	华中大学
广东	675	19657	112	4510	37	1929	岭南大学
四川	408	15954	59	1835	15	875	华西协合大学

三、普世合一运动推动了联合办学

早期的教会书院均由单一教会独立创办，在升级及新创大学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联合事业，形成了所谓的协合型（Union）大学。大学第三任校长方叔轩（1893—1982）曾指出：就联合办学而言，华西协合大学实为最早者之一^⑨。华西协合大学自 1905 年筹备伊始，即联络英美各国、联合各宗派共策协力，以使财力更充足，规模更宏大，效力更充分，这一成功范例不仅是一种教育上的联合，还以教育为纽带，推广为布道、医疗、慈善、文字等事工的联合，进而发展为与国内外同类大学之间联合，成为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兴起的标志之一。

追寻协合的缘起，与更早发生的差会合作密切相连。1877 年是基督新教在四川创基的第一年（此前已有传教士入川考察，但四川首个布道点建于 1877 年），就在这一年，在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传教士会议，大会主席杜嘉德（C. Douglas）告戒各差会：要以十字军东征为殷鉴，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计划的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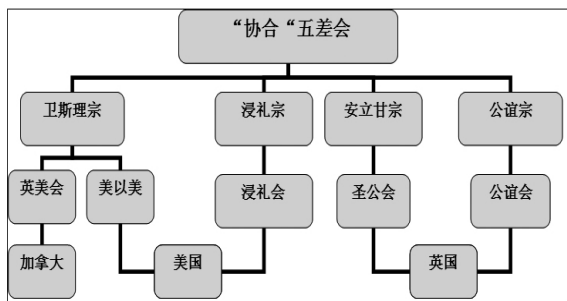
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建议各差会划分福音的势力范围，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避免因重复而浪费人力与物力。大会认为，实现教会在布道上的联合，功效之伟将不可限量，除此之外，教育设备，非联合则力有未充，社会教恤，非联合则施难普及，文字改良，非联合则旧习不能丕变……^⑩。自此以后，教会合一之心日渐明了。当时鉴于教会学校各自为政，绝少联络，因此专门设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 年上海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该委员会扩充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以编辑适用教材、谋取教授之互助，以及探讨中国一般教育问题为宗旨，并于各省设立教育分会，1912 年改称全国基督教教育会，1915 年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31 年定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

1877 年以后的 20 年，华西基督教各会是一种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1899 年在重庆召开首次华西宣教士大会，达成了差会间相互协作的共识，“合作高于冲突”的原则由此确立。1905 年，为改变“各教会分道扬镳，各学校规划不一”的弊端，即有华西学校会的成立。该会由八个驻川教会共同发起，为代表华西各基督教

教育机关的联合会，宗旨为“互相联合，以归划一”，其具体为“甲，划一中国西部基督教之中小各男女学堂，俾得尽美尽善之教育；乙，创立一协合高等大学，以图进步”^②。成立有中小教育委办，大学暂设管理团，前者演变为华西基督教教育会，负责联合全川教会中小学，后者演变为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负责大学的行政指导。

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讨论到“联合大学”的问题，卜舛济建议不同差会应该联合资源力量，创办一所超宗派性的联合基督教大学。由于意见纷纭，各有主张，结论是联合大学还需多些时间进行深入研究。而远在华西的传教士却已在为组建“协合”大学，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和筹商：“从川省布道工作开始，每个教会就开展了独立的教育工作并取得各种成功。在清帝国教育觉醒时，1906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很显然，西式教育将是中国新世纪的基础，如果教会要迎接这一亟需，他们只有通过联合，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③“在中国西部建立一所大学，距离的遥远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学校的设备和人员开支也将会耗资巨大”^④，因此联合组建华西协合大学，差会的负担可能是最小化，集合的效力却可发挥至最大化。最初参与“协合”谈判的七个差会中，伦敦会、内地会于中途宣告退出，其余五个差会则于1907年终于等到了海外总部对协合方案的批准答复。

图表6 华西协合大学组织差会示意图



1910年，对华西教会教育乃至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这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同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上，穆德倡导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并担任委员会主席。华西协合大学赢得穆德的高度推崇，“经

过对远东教育形势的仔细研究之后，深信这种把努力集中在有限数目的在华联合大学身上的政策是明智之举。四五个这种类型的学校应该得到有识见的基督徒们的全力支持。成都的这个大学在重要性上不亚于任何其它，华西协合大学拥有我们所熟悉的任何最大机会中的一个”^⑤。华西协合大学创校成功，对中国基督教大学起到了示范效应，到1919年在华东沿海一带又有四所基督教大学是由若干个差会联合建立，它们分别位于北京、济南、南京和福州。另外广州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虽不属差会部门所管辖，却是“彻底的基督教院校”。这样，除若干个教派大学外，基督教在中国有七个联合的或非教派的高等院校，一起为在中国传布基督教文化而努力^⑥。

参加协合的五个教派，均在省外建有大学，如美以美会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圣公会有圣约翰大学、文华大学，浸礼会有沪江大学、齐鲁大学。这些学校的设计蓝图、资金来源、师资交换，往往是一气贯通的，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如立志将基督教大学遍布全球的美国高琦博士（John F. Goucher, 1845—1922，又译作高其尔），1910年担任中国基督教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在帮助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并担任董事部主席后，又前往福建帮助建立福建协和大学，并担任该校董事，他多次往返成都、福州等地，为两校高等教育运筹帷幄，捐资助学。信仰以及教派上的同宗同源，使华西协合大学为国内同类大学架起了友谊之桥，连接了沟通之渠，并为抗战时期燕京、齐鲁、金陵等校来华西坝联合办学埋下了伏笔，也使华西协合大学与美国的威斯利安大学、邓克生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有了“血缘式”的联系，为未来的合作与交流打开了大门。

四、海外资本加大了对华事业的投入

以海外资本为命脉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其宏观起伏似乎可看作西方经济周期的一个晴雨表：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遂有1910年前后基督教大学的创办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拖入泥潭，也让在华教会学校

捉襟见肘；1920年代，西方经济繁荣一时，中国出现基督教大学重组合并的小高潮；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国不仅不再有新基督教大学出现，已有各校也纷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配合海外宣教运动，对华教育、文化的投入有明显改善。1860年林乐知到华之初，美国由于爆发了南北战争，监理会无法顾及，林乐知自称：“我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元钱。”^②当时间转到1901年，监理会为实施东吴大学计划，在一次演讲中就募集到5万美元，一个月后，监理会又追加10万美元^③。同样，海外汇款的短缺，曾令英美会在四川的传教士身处危境，1892年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1845—1926）游历至四川，目睹了传教士因营养不良面带菜色，差会仅能为每个传教士提供50英磅的年薪^④。到1920年，英美会为华西筹募的款项增加到每年30万美元，“三倍于教会在移民方面和本地人身上所花的钱”^⑤。

教会学校所需要的经费和人才，“几乎要占宣教会全部经费和人才的半数”，在各项教会事业中，“大概教会因教育费去的金钱、精力，其总额较之因传教而耗去的更多”，且时间愈久耗费愈多，费钱最多者就是大学，从各校的建设和设备上，可知耗费了多少金钱，当然回报也是丰富的，“从它的毕业生中，考查有许多人现已成为社会国家的要人，作了领袖的人物，也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的影响和成绩”^⑥。有数据表明，教会在四川维持一所小学，一年需款100—300银元，而中学则需数以千计，如成都华美中学每年输入款项达7500银元^⑦。华西协合大学因“一切设备，均力求近代化”，1920年大学常年经费5万银元，设备价值30万银元。1930年大学校地价值超过10万金元，建筑设备超过50万美元，用这些美金“足以建造世界最高的纽约帝国大厦”。校方还有个形象的估价，若将大学校地、校舍及设备的总价值换算成银元，叠成一条银柱，1918年这条银柱长一英里零十分之一（约1.8公里），1930年银柱叠至两英里高（约3.2公里），1940年银柱则高达约22公里^⑧，正

如校长方叔轩所言：雄厚之经费，乃是华西协合大学“成功之母”^⑨。

在大学的经费募集中，以美国为最多，英国次之，中国又次之，毕启曾15次横渡大洋，为大学募集资金达100万美元之巨，这些募集经费，皆用以购买校地，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最大的一笔募捐，即是向铝业大王霍尔（C. M. Hall，1863—1914）募得的50万美元基金，为谈成这笔捐款，据说毕启与基金管理人德伟士（A. V. Davis）前后谈话却只有25分钟，却让德伟士十分满意。一个月后，霍尔基金决定给华大50万美元^⑩。

进入192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兴办热潮宣告结束。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教会大学的分布及数量，足以满足区域教育的需要，在一些省区出现了饱和的状态，并有裁并大学的呼声，如1920年华西基督教教育会将办学重心从以前“推广范围”转向“将已有者发展至完善地步”^⑪。（二）为了维持已办的大学，教会已无力组建新的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孤立主义抬头，海外宣教运动的热忱也随之锐减，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自顾不暇，对华文教事业的投入也颇艰难。1933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已觉察海外宣教事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指出海外宣道事业运动主要是依靠临时捐款维系，并没有固定的基金，近来“捐款的数目渐渐减少，各宗派所组织的宣教事业机关，在各方面遇见严重的问题”^⑫。（三）中国公私立大学日渐完善，教会学校逐渐在数量上失去优势，社会影响也难与国内著名大学相抗衡。此时，西国教士有关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地位”的疑问，就反映出这种挫折感和失落感。为了解困舒压，办学重心也转变为“由数量到质量”。

（责任编辑：若火）

① 今人通常采用1933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的“十三校”的说法。分别是：燕京（北京），齐鲁（济南），金陵男大（南京），金陵女大（南京），圣约翰（上海），沪江（上海），东吴（苏州），之江（杭州），福建协和（福州），华南女子协和（福州），岭南（广州），华中（武昌），华西协合（成都）。

- ② 海外归来客：《对于基督教教育权收回之我见》，《华西教育季报》第3卷第3号，1925年9月。
- ③ 所谓的“五大学区”，即教会人士区划的：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华西区。
- ④ 《美道会牧师信笺》（1910年），成都：美道会，1910年。
- ⑤ Band, Edward., *Work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 ⑥ Ruth Tucker, *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Grand Rapids: Academic Books, Zondervan, 1983, pp. 327-328.
- ⑦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98年版。
- ⑧ [美] 贾腓力：《中华教育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68-71页。
- ⑨ Joseph Beech, “Rocks and Romance in Growing a Colle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24”, *Beech's Address*, Chengdu: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40, pp. 19-20.
- ⑩ Proceedings of the Acting Board of Education Committee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Union University Temporary Board of Management.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ristian Educational Union of West China, Chengdu, October*, 1908, Chengdu: 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Press.
- ⑪ 《华西协合大学校章程汇录》，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5年。
- ⑫ 根据1908年《华西学校会会议书》整理。注册学校与实际数目有差距，以1916年为例，有的差会注册学校占九成，有的仅占一成。统计华西全教会所办学校564所，注册者仅270所，为47%。
- ⑬ 杨开甲：《毕启博士创办华西协合大学之伟绩》，《毕启先生受勋典礼纪念特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40年。
- ⑭ 《总干事对于教育部报告书》，《华西教育会年会书》，成都：华英书局，1918年。
- ⑮ Joseph Beech, “Rocks and Romance in Growing a Colle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24”, *Beech's Address*, Chengdu: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40, p. 31.
- ⑯ 毕启：《华西协合大学校给华西教育会董事部报告》，《华西教育会年会书》，成都：华英书局，1925年，第34-39页。
- ⑰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3、210-211、233、311、387-388、453-455、536-537、591页。
- ⑱ 方叔轩：《本校工作之回顾与最近方针》，《华西协合大学三十八年校庆特刊》，1949年。
- ⑲ 中华续行委员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序》1918年，第5期，第4-5页。
- ⑳ 华西学校会：《华西学校会纲例》，成都：华英书局，1911年。
- ㉑ “Historical Sketch”,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December, No. 12. 1913., pp. 3-4.
- ㉒ 《留校学生临时学生会开幕时之校长演说词》，《华大学潮特刊》，1926年。
- ㉓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19), Middletown, Conn: Press of Pelton & King, Inc., pp. 17-18.
- ㉔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1919), Middletown, Conn: Press of Pelton & King, Inc., pp. 17-18.
- ㉕ Warren Candler, Y. J. Allen, *The Man Seeded China*. Nashville: Cokesbury Press, 1931, p. 82.
- ㉖ 文乃史著，王国平等译：《东吴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21-22页。
- ㉗ 阿绮波德·立德著，王成东等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 ㉘ 文忠志著，李国林等译校：《中国出的革命者：文幼章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 ㉙ 贾立言：《基督教史纲》，上海：广学会，1928年，第462、464页。
- ㉚ 有关资料来源于《美道会牧师信笺》（1910年），以及《华西教育季报》1925年9月。
- ㉛ 根据《华西协合大学报告书》整理，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8、1930、1940年。
- ㉜ 方叔轩：《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代理校长方叔轩报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33年。
- ㉝ 刘之介：《毕启先生逸事》，《毕启先生受勋典礼纪念特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40年。
- ㉞ 《1919年华西教育会总干事对于年会教育部之报告》，《华西教育会年会书》，成都：华英书局，1919年。
- ㉟ 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编，徐宝谦、缪秋笙、范定九译：《宣教事业平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6页。